

流量冲击下“网红”城市何以“敏捷治理”

——以淄博和天水为例

张 萌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 102249; zhangmeng_cupl@163.com)

摘要: “网红城市”是数字时代巨额流量催生下的新型城市形态, 其政府应对治理挑战的行动是敏捷治理的典型表征。本文以近年来“爆火出圈”的山东省淄博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为典型案例, 应用比较研究方法, 将时间维度与“结构-过程-效能”分析框架相结合, 对两地政府的治理实践进行案例内与案例间比较分析, 进而探讨其在流量冲击下实现敏捷治理转型的异同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 以期“网红城市”走向“长红”和城市政府在数字时代重塑治理模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流量冲击; 网红城市; 敏捷治理; 比较研究; 数字时代

引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纵深开展使得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特征越发显著, 数字空间与实体空间“孪生发展”的新型治理情境逐渐生成[1]。“流量”原本是物理学领域的专业名词, 也指人类社会中各类资源、要素的结构性质运作形态[2]。随着人、技术与信息在数字时代的交互愈加频繁, 流量一词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表示网站人气访问量或手机移动数据, 并深度内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深刻形塑着个体的价值观念且逐步成为支配个体行动和重构社会秩序的关键力量[3], 流量社会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社会逻辑与生存架构正在日益崛起[4]。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的快速崛起, 一批各具特色的城市在网络流量的推动下“出圈”成为“网红”。这一现象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加剧了城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对其治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城市政府必须建立更有整体性调适能力的新型治理模式[5]以快速、妥善地处理突如其来的巨额流量。在此背景下, 学界提出了多种治理逻辑。其中, 敏捷治理作为融合善治理念、多元合作供给模式和公共需求目标的治理范式[6], 或可成为地方政府的“破局之道”。然而, 当前“网红城市”治理实践中所蕴含的敏捷治理模式尚未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 “网红城市”类型多样, 其政府应对流量冲击的策略也不尽相同, 应用比较研究方法方能深入发掘其规律所在, 但既有研究在探讨此类问题时对比较视角的应用仍稍显不足。

有鉴于此, 以同因地方特色美食而爆火的山东省淄博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为典型案例, 应用比较研究方法, 探究“网红城市”政府在数字时代的流量冲击下进行敏捷治理转型的内在机制并总结相应的经验启示, 以期数字时代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塑提供参考与借鉴。

1 文献综述

1.1 数字时代的“网红”城市

城市是多种优质资源的汇集之处, 人口、自然、物质、社会、经济和信息等多种要素在城市中进行着持续、频繁的流动与交融, 城市本身即是吸引各类流量的强大磁场[7], “网红城市”的生成正是依托数字时代

的流量红利打造城市品牌形象的过程。虚拟空间中网络流量的持续攀升为城市带来了人流、物流和经济流等实体性的变革,城市的“网红化”在提升其影响力的同时,也塑造着城市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经济结构、基础组建、组织架构和工具机制[8]。

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网红城市”并未给予较多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城市传播学的角度展开,聚焦其“可沟通性”[9]、传播策略[10]以及数字媒介对城市传播价值转化的作用[11];对此类城市治理问题的探讨也多注重分析其生成与发展方式[12,13]、营销策略[14]和影响效应[15]。虽已有学者关注到了“网红城市”政府的治理转型机制[1,16]及其过程中的多元主体行动逻辑[17],但此类研究的数量仍较为有限且对其中经验启示的总结尚不足够;此外,在研究策略的选择上,学者们多倾向于通过分析实践案例寻求问题答案,但鲜少应用比较研究的视角且对除淄博以外的城市实践缺乏系统化分析。

1.2 数字时代的城市敏捷治理

敏捷即反应迅速快捷,敏捷治理最初始于国外的软件工程领域,后扩展至与组织和国家治理相关的研究[18,19]。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出版《敏捷治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政策制定的重构》白皮书,将敏捷治理明确定义为“一套具有柔韧性、流动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决策过程[20]”。自此,敏捷治理开始在政府内部管理、公共政策优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16],一场敏捷运动伴随着各国政府的数字化改革而兴起[21,22]。当前,学者们对敏捷治理的概念界定[23-25]、价值特征[26,27]和实践类型[28]等均进行了深入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29]。同时,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风险应急管理[30,31]、城乡政府建设与数字化治理转型[32-35]等方面的敏捷治理问题,也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行业监管领域[25,36]。但总体而言,敏捷治理作为近年来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关研究的数量仍较为有限。

对于“网红城市”而言,线上与线下巨额流量的迅猛冲击考验着其应急响应能力、组织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政府在此情形下需作出兼具灵敏性、迅捷性和适应性的全方位变革,是敏捷治理的生动体现。然而,此类政府实践所蕴含的敏捷治理模式尚未得到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众多“网红城市”因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其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城市政府敏捷治理实践的差异与共性也有待进行深入的比较探究。

至此,基于上述回顾,本文试图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以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网红城市”中均因特色美食而爆火“出圈”的山东省淄博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为典型案例,探讨数字时代不同“网红城市”政府为应对流量冲击而形成的敏捷治理模式在结构、过程与效能等方面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相应的经验启示,进而构建能够阐释“网红城市”成功实现敏捷治理的理论模型,以期拓展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数字时代的政府转型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分析框架:“结构-过程-效能”

地方政府的治理本质上是治理体系的持续运作,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责的不断履行和动态调试[37],敏捷治理正是旨在构建一种能够快速灵敏应对公众需求的治理模式,以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并改善用户体验[16]。“网红城市”政府在流量冲击下的敏捷治理实践可理解为其基于内外部环境变动和自身资源禀赋,为化解治理困境、抓住发展机遇和实现长期效益而对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及其自身治理方式进行重塑的过程。

吴晓林通过对结构功能主义思路的辩证分析,参照默顿的中层理论主张,建构了“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用于考察政治社会实践的操作主体、运行逻辑、运行效果和主体关系[38]。其中,结构是行动主体间的关系,过程则是各方力量的博弈与互动。这一范式兼具静态与动态思维,在有关政府治理实践的研究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拓展[39-41]。而除结构与过程外,既有的敏捷治理理论框架中还关注了治理的节奏、工具、核心和效能等方面的内容,资源环境也始终是影响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变量。故笔者在借鉴“结构-过程”框架基本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搭建起“结构-过程-效能”分析框架(见图1),并以此为基础对所选案例中的政府敏捷治理实践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探讨和归纳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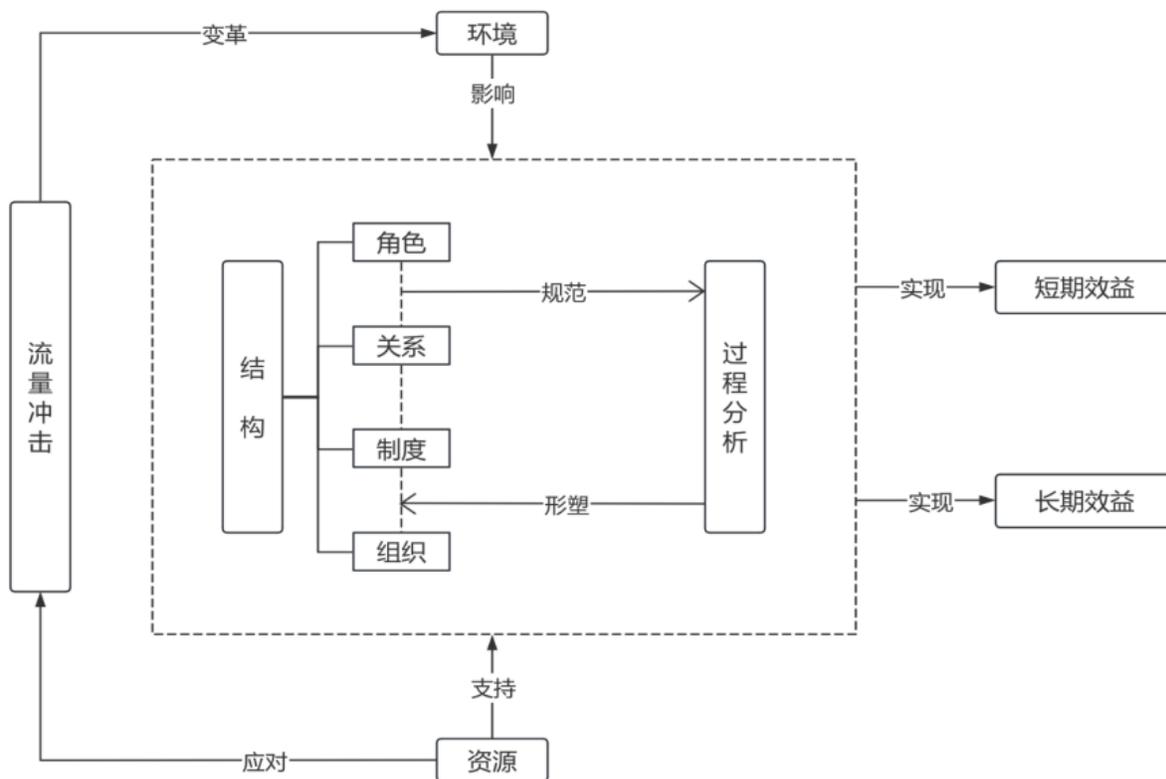


图1 “结构-过程-效能”框架

2.2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取

多案例研究方法是在理论抽样原则的指引下，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案例进行对比和分析，进而在识别相似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实现理论构建[42]。相较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能够在比较中更加准确地确定构念的定义、抽象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为理论生成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并提升其推广性和普适性[43]。本文旨在归纳出能够阐释“网红城市”在流量冲击下何以成功实现敏捷治理的理论模型，属于理论构建式的探索性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适于达成研究目的。

多案例研究方法在案例选取方面并不仅仅考虑案例的独特性，而是更多地基于案例对理论建构的贡献[44]。据此，本文以研究问题和比较研究的案例选取原则为导向，将山东省淄博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作为分析对象。

淄博与天水同为近年来爆火“出圈”的“网红城市”，二者皆因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对地方美食的宣传而迅速走红，且此前均为以发展工业为主的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其政府在面对线上线下巨额流量冲击时均缺乏经验，但都作出了及时、妥善的回应，是敏捷治理典型表现；其次，两座城市在成为“网红”后均逢清明与五一假期，期间愈发密集的客流量虽为当地带来了“泼天富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雪上加霜”；同时，对淄博而言，其作为最早“出圈”的城市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相关经验，而对天水而言，“出圈”事件的偶发性也使其难有充足的时间对“前辈城市”的应对方式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学习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灵”让二者均显得措手不及；此外，淄博和天水在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面临相似度极高的治理难题时，其政府的解决策略也自然不尽相同。由此可见，淄博与天水应对流量冲击的治理实践具有“问题异解”特征，以此二者为分析对象兼具代表性与可比性且契合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3 案例内比较与特色模式

在进行跨案例比较前进行单个对象的详细剖析有助于产生新的见解和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42]，因此，本文首先以时间为基准，分别探讨淄博和天水在不同流量阶段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并基于分析框架归纳其各自特征。

3.1 “核心统筹”的淄博模式

淄博是位于我国东部的一座工业型三线城市，具有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和智慧城市建设基础，且有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底蕴支撑，但其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产业结构重、发展层次低、环境质量差等问题，经济增长略显乏力、转型压力较大。

2022年5月，山东大学1.2万名学生在淄博隔离，当地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并在解封临别时以烧烤宴为他们饯行，双方当即相约“春暖花开，再来做客”。2023年3月初，几千名大学生如约而至。3月4日，一则“大学生组团到淄博吃烧烤”的话题登上抖音同城榜热搜第一，进而逐步引发了“进淄赶烤”热潮，也对这座一直以来缺乏旅游潜质的城市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在此情形下，淄博市政府迅速作出回应。3月6日，多部门联合对烧烤店开展专项检查，3月10日召开了“淄博烧烤”新闻发布会响应社会关切并对后续工作进行统筹协调。淄博市委、市政府也在保留下来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制的基础上成立了烧烤联席会议机制和工作专班，并设立了市级、区县级烧烤推广领导小组和烧烤指挥部，下设民生保障组、维稳组、宣传组等，以便随时协调公安局、商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4月初，淄博烧烤热度扶摇直上，市政府因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烧烤店商家和游客的优惠保障措施：如成立“烧烤协会”协助政府制定烧烤发展规划与行业规定、举办烧烤节、优化基础设施和设立烧烤行业“一件事一次办”专区等，并通过“智慧淄博烧烤服务”小程序为及时进行舆论监测处理提供数字化保障。同时，淄博市也接连发布了《关于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等规范市场秩序的要求，并在4月15日将联席会议机制调整为提振消费联席会议机制，将工作专班由原来的5个扩充为10个，实行集中办公；市委、市政府也积极发动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此外，市政府分别在4月19日和4月26日发布了《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和《致广大游客朋友的一封信》，及时根据自身实际接待能力对烧烤热潮进行理性“降温”，在动员、感激全市人民为淄博“保驾护航”的同时更进一步保障了游客体验，诚意十足。

尽管淄博烧烤的热度在“五一”后逐渐退去，但市政府仍旧延续了此前的管理工作经验，将烧烤专班转化为了常设的“夜间经济办公室”并持续开展文旅惠民促游活动，也将工作重点转移至招商引资、提振消费和人才引进等方面，致力于实现长期效益。

由此，淄博市在“进淄赶烤”热潮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组织调整和制度完善，在舆情管理、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社会动员和公民引导等方面及时开展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成功接住了当下的流量并以此为基点推进长效发展，形成了以烧烤服务为核心、主要领导积极担当、机制引领、部门联动、智慧赋能、社会响应的“核心统筹”型敏捷治理模式（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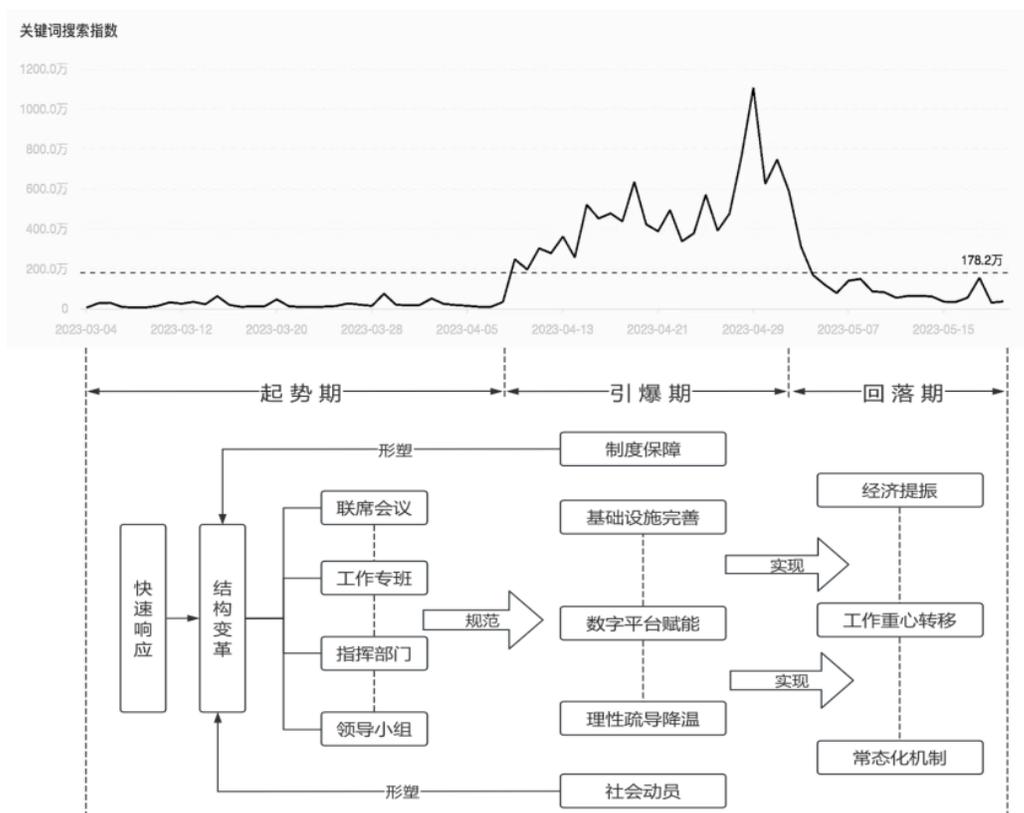


图2 淄博“核心统筹”式敏捷治理

3.2 “全域整合”的天水模式

天水是位于我国西部的一座传统工业型五线城市，有着八千年文明历史和“羲皇故里”的美誉，多年来致力于打造“千山万水·就爱天水”文旅品牌并积极推进基层行政减负工作。但作为深居内陆的欠发达地区，其公共服务体系化和数字化发展相对缓慢，且一直面临着财政紧张问题，债务压力沉重，文旅产业发展不温不火。

2024年2月13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一则仅有7秒且只有一个画面、一句台词的天水麻辣烫短视频。此后的一个月里，天水麻辣烫以极快的速度点燃网络、正式走红，但巨额流量对这座西北小城而言无疑是一场治理能力的“大考”。

对此，当地党委、政府第一时间采取措施。3月13日，天水市麦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率先发布了《关于规范全区“麻辣烫”等餐饮服务经营者的告知书》并深入一线规范市场秩序；3月16日，天水市委书记主持召开“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进会进行紧急部署并印发了《2024年“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方案》等指导性文件。

3月17日起，天水麻辣烫热度高速攀升，市政府立即成立了麻辣烫保障服务工作专班，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专职抽调20多名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并确定了“省市统筹、两区为主、五县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基调，并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完善、提供游客出行保障、举办麻辣烫“吃货节”、有效引导处理网络平台舆论、鼓励知名“博主”进行线上宣传，众多市民和企事业单位也自发提供了志愿服务支持。

3月下旬，天水麻辣烫热度渐趋平稳，天水方面深刻意识到，如果仅靠麻辣烫，很难让“头回客”变“回头客”，于是打出了全城动员和全省联动的“组合拳”，不仅与甘肃省内的其他市州进行文旅联谊，而且积极推动麻辣烫保障工作与伏羲庙和麦积山石窟等景区资源深度融合、与甘谷辣椒和秦安花椒等农特产业深度绑定，在实现热度分流的同时带动多元业态发展。2024年4月16日，天水市委市政府发出官方感谢信，以表达社会各界对其工作的支持与认可。

随着流量的日渐消逝，天水市政府在延续良好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倾力打造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不仅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也推动知名麻辣烫品牌商标注册和关联产业竞争力提升，并于2024年12月发布了首个市级地方标准《天水麻辣烫经营管理规范》。

可见，天水市政府在不同的“热辣滚烫”阶段通过组织架构和治理策略的及时灵活调整，形成了领导当先、专班驱动、区域联动、产业融合、文旅赋能的“全域整合”型敏捷治理模式（见图3），不仅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多维度提升，其政府也因流量刺激而“奋力一跃”，在端好手中麻辣烫的同时积极促进当地的全面持久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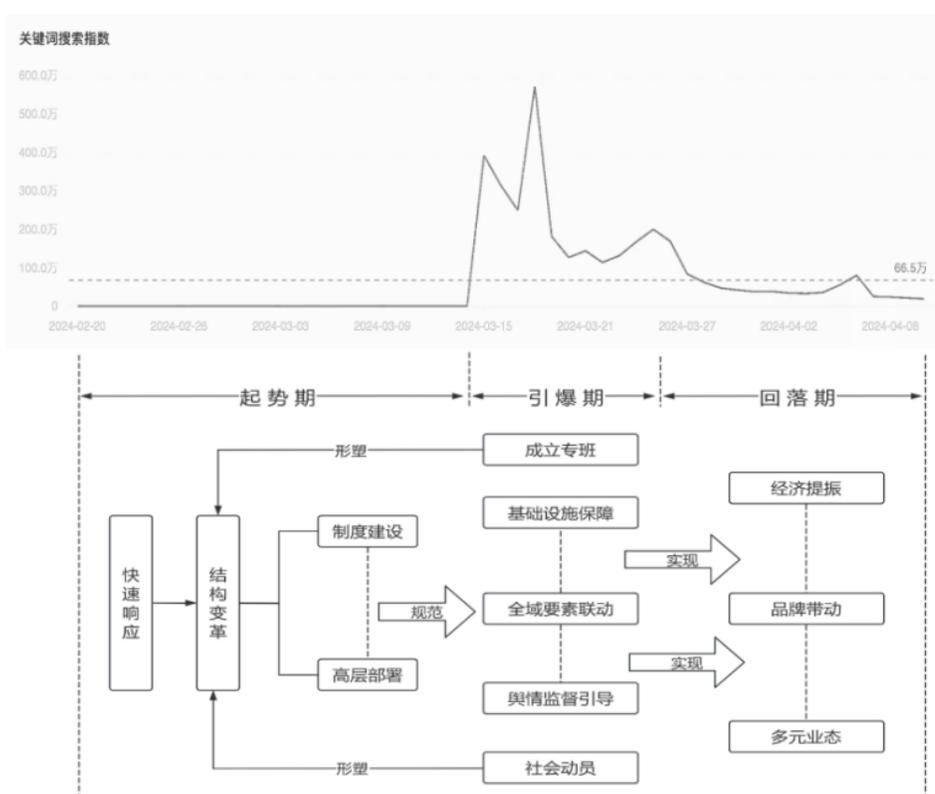


图3 天水“全域整合”式敏捷治理

4 跨案例比较与理论模型

4.1 天水与淄博敏捷治理模式的比较

通过以上的纵向比较分析可知，淄博和天水政府均在流量冲击的不同阶段采取了相应的差异化对策，既有效应对了治理挑战也逐步实现了自身治理能力的多维度提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敏捷治理模式，为其今后的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保障。从中也可看出，两市政府的举措在结构、过程和成效方面存在诸多异同。因此，进一步对二者的敏捷治理模式进行横向对比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启示。

在完善结构方面，二者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均及时成立了能够灵活调动的工作专班并积极推进多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有机联合，政府持续深入基层，市民则以主人翁的身份为城市发力，在极大程度上突破了常规时期政府内部的等级制关系和政民之间的“号召-响应”关系，形成了各方力量密切配合、主动回应、灵活调试的协同治理机制。同时，两地政府均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性文件，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淄博基于原有的指挥部建制而形成的组织架构在总体统筹方面明显更有经验，天水则由于此前的减负措施在深入一线和精简流程方面更具优势。

在具体实施过程方面，淄博与天水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基础设施、便利游客体验和监测处理舆情的有效措施，两地政府部门也均发布了表达感谢的官方文件，发挥了情感治理的作用。但淄博市自2017年起就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当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数字化治理技术和治理体系，其也因此在此流量冲击下通过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作用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治理的精度和效率，天水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则稍显逊色，仅利用部分商业媒体平台进行了常规性的数据观测和网络宣传。但水市的文旅资源、长期积累的文旅品牌打造经验以及与麻辣烫密切关联的辣椒、花椒等特色农产品却是淄博所不具备的，其也因此重点实施了景区分流、产业联动的全链条发展策略，相较而言，淄博的举措主要以保障烧烤服务为中心，对其他业态的发展略显不足。

在治理效能方面，淄博与天水敏捷治理模式的短期成效趋同，均使其成功应对了治理挑战且实现了爆火时段内的经济显著增长。从长期来看，淄博市主要以流量为基点积极推进组织结构完善、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人才引进和烧烤产业链延伸，天水市则致力于持续发挥麻辣烫的品牌带动效应，依托此前经验倾力打造“天水麻辣烫+”多元服务模式，加快推动以麻辣烫为代表的食品产业规范发展，并促进当地文旅品牌提质增效。

综上，淄博与天水在面对流量带来的治理挑战时，其治理模式均呈现出及时响应、适应需求、多元协同和摸索学习的敏捷特征，但由于两地在资源禀赋、文化传统、治理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二者的敏捷治理模式也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同时，烧烤与麻辣烫这两种美食在社交属性、制作方式和材料来源等方面的本质区别以及淄博和天水各自的交通区位特征也使两地的流量热度在总量和持久性等方面存在差异。

4.2 “网红城市”治理的“敏捷”经验

数字时代，网络媒体平台高度发达、城市“出圈”现象极为频繁，通过比较分析总结淄博和天水案例中的敏捷治理经验能够为其他城市治理的优化完善和“网红”走向“长红”提供有益参考。

4.2.1 治理结构：灵活调试，多元协同

快速和弹性是敏捷治理的显著特征。在流量冲击下，城市中的治理情境瞬息万变，公众诉求复杂多样，政府不仅要治理问题灵敏感知，还必须作出迅捷精准的应对举措，上传下达、等级明确的官僚制组织架构面对这一需求显然乏力。在淄博与天水的治理实践中，二者均迅速成立了极具业务针对性和人员灵活性的工作专班，并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协调下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治理过程，进而实现了治理挑战下的精准施策和联合突围。

4.2.2 治理过程：数字赋能，因地制宜

敏捷治理强调时效和效率，促进数字技术与治理过程深度融合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便利并助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淄博健全完善的数字技术基础是其治理模式中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在完美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同时为应对巨额流量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此外，敏捷治理并不意味着一味求快而脱离现实，地方政府必须基于当下治理需求和原有资源禀赋进行适当的敏捷转型。淄博和天水均结合自身资源状况和治理环境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治理策略，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并为后续的长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2.3 治理效能：以人为本，长效发展

治理的目标即是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以人为本是敏捷治理的宗旨和原则之一。此外，尽管敏捷治理注重对问题的快速反应，但其并不只是昙花一现，而是一种需要在治理过程中长期贯彻的思维方式和一套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治理模式。淄博与天水之所以能够稳稳接住流量并广受好评，重点就在于其自始至终为公众着想的服务态度。当流量及其带来的压力逐渐退去，两地政府也并未丢弃“非常时期”的治理成果，而是将其转化、应用于后续的治理实践当中，进而有益于自身治理能力的持续优化完善。

由此可见，巨额流量虽对城市政府提出了极大的治理挑战，但更为其进行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绝佳契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淄博和天水的实践中归纳“网红城市”政府在流量冲击下成功实现敏捷治理的理论模型（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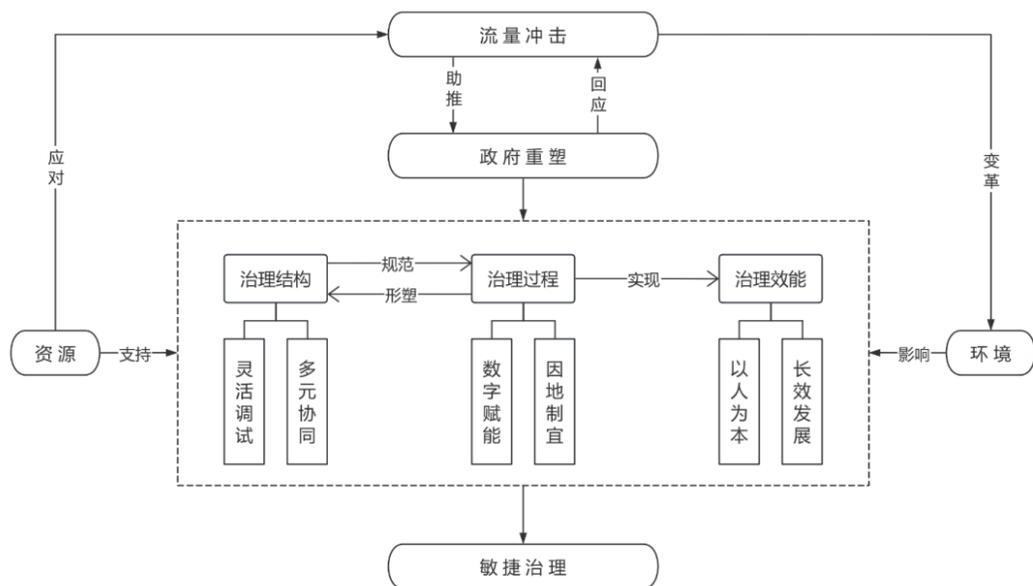


图4 “网红城市”敏捷治理模型

5 结论与展望

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城市已由传统社会的“庇护之所”转向信息社会的“流量之城”，“网红城市”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城市形态[1]，其治理模式是政府进行敏捷治理转型的典型表征。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为典型案例，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在“结构-过程-效能”框架的指导下，通过案例内和跨案例比较分析归纳出“网红城市”在流量冲击下何以成功实现敏捷治理的理论模型，在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能为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和政府治理挑战面前的有效重塑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

同时，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由于人力与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者所能收集到的案例相关资料较为有限，恐难还原事实全貌；应用案例研究法所得理论模型的可靠性与推广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对其他“网红城市”的敏捷治理模式进行多维度的比较探究也是后续研究需要深化的主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1] 向静林, 艾云.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1): 4-23, 204.
- [2] 曹冬松, 方雷. 数字时代的“网红城市”: 生成形态、流量效应与治理转型——基于典型城市的案例考察[J]. 电子政务, 2025(1): 52-64.
- [3] 刘威, 王碧晨. 流量社会: 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8): 71-83, 158-159.
- [4] 余伟如. “流量社会”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学探析[J]. 理论与改革, 2020(5): 177-188.
- [5] 易承志. 从刚性应对到弹性治理: 韧性视角下城市应急管理的转型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5): 63-71.
- [6] 任宗哲, 赵一诺. 敏捷治理赋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理论机理与实践进路[J]. 人文杂志, 2024(11): 94-107.
- [7] 于焱, 董俊杰, 马国庆. “城市流量”冲击下的博物馆表征及应对策略——以“淄博烧烤”流量和淄博市文博场馆为例[J]. 东南文化, 2023(6): 169-175.
- [8] 吴晓林. 数字时代的流量城市: 新城市形态的崛起与治理[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4): 62-72, 242-243.
- [9] 陈莉, 李颖, 岑飞燕. 理解城市与媒介: 流量语境下网红城市的“可沟通性”[J]. 传媒观察, 2024(12): 92-98.

- [10] 袁华, 沈正赋. 有“缘”有“故”: 媒介社会视域下网红城市文化的设计理念、生成机制和传播策略[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6): 31-37.
- [11] 刘铭秋, 梅杰. “出圈”: 城市流量竞争的媒介化及其建构逻辑[J]. 宁夏社会科学, 2024(6): 167-176.
- [12] 张玉, 王雨欣. 小城的突围: 网红“小城”的构筑逻辑和长红对策[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11): 126-132.
- [13] 严小翔, 李济翔. 网红城市何以长红?影响城市品牌可持续性的因素——基于26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6): 38-46.
- [14] 罗昕. 短视频时代流量城市的营销与治理[J]. 人民论坛, 2023(12): 106-109.
- [15] 陈晓红, 李杨扬, 汪阳洁, 等. 网红城市、流量效应与旅游发展[J]. 管理科学学报, 2022, 25(1): 1-22.
- [16] 陈俊峰, 曾泉海. 短视频时代流量城市情感治理的实践模式与过程机制——以淄博、哈尔滨与天水为例[J]. 学习与实践, 2024(12): 119-131.
- [17] 刘佳, 纪晓萌. 旅游出圈城市的网络流量时空跃迁及多主体行动逻辑[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6): 135-143.
- [18] OVERBY E, BHARADWAJ A, SAMBAMURTHY V. Enterprise agility and the enabling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06(2): 120-131.
- [19] 李欣欣, 滕五晓. 敏捷治理: 发展脉络及其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展望[J]. 城市问题, 2023(2): 38-48.
- [20] WORLD ECONOMIC FORUM. Agile Governance: Reimagining Policy-making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EB/OL]. (2022-10-25) [2024-07-03].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Agile_Governance_Reimagining_Policy-making_4IR_report.pdf.
- [21] MERGEL I, GONG Y, BERTOT J. Agile government: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8, 35(2): 291-298.
- [22] MERGEL I, GANAPATI S, WHITFORD A B. Agile: A New Way of Govern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1, 81(1): 161-165.
- [23] YU X, PETTER S. Understanding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practices using shared mental models theory[J]. Information & Software Technology, 2014, 56(8): 911-921.
- [24] KARIMA A, ABDELOUHAB B, et al. A framework combining agile, user-centred design and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approaches for collabora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018, 12(3/4): 364-392.
- [25] 薛澜, 赵静. 走向敏捷治理: 新兴产业发展与监管模式探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8): 28-34.
- [26] 吴磊, 冷玉, 唐书清. 数字化时代敏捷治理的学术图景: 研究范式与实现路径[J]. 电子政务, 2022(8): 77-88.
- [27] 于文轩. 奔跑的大象: 超特大城市的敏捷治理[J]. 学海, 2022(1): 139-149.
- [28] 孙志建, 耿佳皓.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 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叉案例研究[J]. 电子政务, 2023(2): 2-17.
- [29] 谢小芹, 任世辉. 数字经济时代敏捷治理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来自成都市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证据[J]. 城市问题, 2022(2): 86-95.
- [30] 陈扬, 赵漫, 欧阳桃花, 等.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捷性机制研究——四川省新冠疫情案例[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1): 73-87.
- [31] 胡贵仁. 模糊应对、数字赋能与敏捷治理——超大城市风险防控的逻辑转向及困境超越[J]. 城市问题, 2022(9): 87-94.
- [32] 赵静, 薛澜, 吴冠生. 敏捷思维引领城市治理转型: 对多城市治理实践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8): 49-54.
- [33] 赵星, 陆绮雯. 元宇宙之治: 未来数智世界的敏捷治理前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 48(1): 52-61.
- [34] 韩瑞波.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4): 132-140.
- [35] 葛天任, 裴琳娜. 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J]. 理论与改革, 2020(5): 85-96.
- [36] 李晓方. 理念、激励与共享经济的敏捷治理: 基于地方政府网约车监管实践的实证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6): 42-48.
- [37] 何增科.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1): 11-15.

- [38] 吴晓林. 结构依然有效: 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J]. 政治学研究, 2017(2): 96-108, 128.
- [39] 赵书松, 赵旭宏, 赵莉娜, 等. 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权力观念质性研究[J]. 管理学报, 2025, 22(3): 427-437.
- [40] 周建青, 龙吟. 府际向度、灾害经历与跨区域应急合作——基于京津冀区域危机事件的多案例分析[J]. 求实, 2025(2): 17-27, 109-110.
- [41] 卢志朋, 陈国权. 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基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实践的一种理论建构[J]. 学术月刊, 2024, 56(12): 73-85.
- [42]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 [43] YIN R K, THOUSAND S.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M]. 4th ed. Oxford: Blackwell Science Ltd, 2009.
- [44] EISENHARDT K M. Better stories and better constructs: The case for rigor and comparative logic[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3): 620-627.